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ANJIU

中國現代
文學研究

丛刊

4

1991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

4

1991

作家出版社

封面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张晓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九一年 第四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中国现代文学馆 合编

*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50,000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100册

国内统一刊号：CN 11—2589 定价：3.50元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

1991年第4期 (总第49期)

目 录

· 文学史研究 ·

历史汇流中的抉择

- 论五四时期中西文学理论的融合与嬗变……………罗 钢 (1)
- 编织浪漫炽情的神话……………苏 冰 (28)
- 论九叶诗派的现代主义背景……………毛 迅 (51)

· 纪念胡适诞生一百周年 ·

- 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欧阳哲生 (69)
- 漫评胡适的小说考证……………易竹贤 (89)
- 从宋诗到俗话文学：
论胡适构筑文学史的逻辑程序……………〔香港〕陈国球(109)

· 作家作品研究 ·

- 老舍“市井小说”探究……………沈渝丽(119)

艺术感知的生命空间

——表现主义与曹禺早期的艺术风格……………宋剑华(128)

沈从文短篇小说中的人物……………〔香港〕汤禎兆(146)

· 文学史观讨论 ·

文学史的哲学思考……………田本相(168)

文学形态、文学主题与文学的历史

——有感于《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魏建(172)

我们的意见

——答“文学史观讨论”提纲……………张华 张中良 刘应争(178)

国内现代文学史著作出版历史述评……………冯光廉 谭桂林(184)

· 资 料 ·

台湾文艺家联盟与左翼文学运动……………安兴本(207)

现代文学期刊拾零(一)……………姜德明(219)

林徽因的笔名和佚诗……………陈学勇(230)

翡冷翠日记残篇……………徐志摩原著 傅光明译(233)

· 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在南朝鲜的历史与现状……………〔南朝鲜〕金时俊、金泰万著 尹成奎译(234)

· 书 评 ·

“一部忠实而有分量的作家传记”

——读《孙犁传》……………学 正(251)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及其前景

——读新近出版的两部现代文学研究专著……………肖同庆(258)

· 动 态 ·

创造精神永不磨灭——创造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周亚琴, 267)

李劫人长篇小说的史诗追求——李劫人学术讨论会纪略(涪 村,

273) 刘半农及其文化遗产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江阴市隆重举行

(付 会, 276) 叶圣陶研讨会召开(文 木, 278) 陈瘦竹

戏剧理论研讨会在京召开(周 宁, 280) 《中国解放区文学书

系》编选工作顺利进行(石 林, 283)

· 论 文 摘 编 ·

萧红和中国现代小说散文化(阎志宏, 284) 女性: 作为话语的

主体——从《莎菲女士的日记》与《紫色》看女性日记体、书信体小说(陈

晓兰, 285) 复仇与变形——《白毛女》主题意义琐谈(谢伟民,

286) 蹇先艾的乡土小说(马 佳, 287) 论“五四”初期文化

批评派(谢昭新, 289) 林语堂散文创作简论(沈 栖, 290)

郑伯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武德运, 291) 闻一多的

诗歌美学观及其发展演变(龙泉明, 292) 失落者的歌唱——

析《梦之谷》(余凌, 293) 京派小说的形态和命运(杨 义, 294)

中日新感觉派比较论(阎振宇, 296) 《围城》与喜剧精神

的兴起 (俞吾金, 298) 社会大变革期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
——试析“零余人”与“边缘人”的生存烦恼 (王喜绒, 299) 时代大
潮与小说形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管窥 (刘增杰, 301) 论创
造社作家的文化心态 (黄侯兴, 302)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总目录.....(304)

1992年邮购征订启事.....(266)

编后记.....(313)

历史汇流中的抉择

——论五四时期中西文学理论的融合与嬗变

罗 钢

本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接受美学为中西文学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的影响研究关注的是一个作家或一部文本在另一国或另一文化中的传播和成败。而接受美学关注的是读者或接受者对一部文本的积极参与、阐释和创造。关心的是这一文本的“阐释潜能”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各不相同的具体实现，以及制约着这种实现的诸种因素，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在研究五四时期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影响时，便不仅需要从现象上追溯各种西方文学思潮和文学观念的来踪去迹，更重要的是研究它们独特的具体实现，即它们在中国的转化形态和转化方式，以及制约着这种转化的各种历史文化因素。从接受的角度看，当各种西方文学思潮和文学观念在五四时期进入中国时，它面临着三种不可回避的历史联系，就过去而言，它面对着中国古老的文学和文学理论传统；就现实而言，它面临着五四时期中国独特的社会、思想和文学要求；就未来和发展而言，它面临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代兴和挑战。正是在由以上各种联系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网络中，正是在以上各种历史因素的互动影响下，各种西方文学理论实现和完成了自身“中国化”的过程，当然，制约和影响着这种过程的，除上述三种客观的思想因素以外，还不能忽略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的主观态度和选择。于是，以上四者，就构成了本文关

注的主要方面。

制约着各种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发生创造性转化的首要因素，就是五四时期特定的社会思想和文学要求。

依照五四知识分子当时的认识，作为一个整体，近代西方文化是一个与中国古代封建文化异质的新型文化，它内部包含的各种近代文艺思潮都有可能满足和配合五四时期中国反封建思想斗争的需要。因此，五四知识分子对它们都抱着热情欢迎、兼收并蓄的态度。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滞后性，即使抛开中西文化的差异不谈，就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着眼，中国和西方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距和历史的“错位”。因而反映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文艺思潮，它们由其独特的历史内容所规定的观念、感受、理想乃至形式技巧便不可能与中国五四时期的社会和文学需要完全吻合。尽管五四作家们热切地希望在尽短的时间内全部吸收和消化西方在几百年间积累的思想和文学精华，但实际上所能接受的只是一小部分，只是那些满足和适应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要求和作家的接受能力的部分，归根到底，任何文学接受都是由接受者的需要和能力决定的。

从这种立场来看，各种近代西方文艺思潮在中国的变迁和转化，其决定性的因素便不在这些思潮自身而在当时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要求，即以“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为核心的时代启蒙要求。这种反封建的时代启蒙要求，透过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中介有力地制约着各种西方文艺思潮在中国的吸收和转化。即以浪漫主义而言，西方浪漫主义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近代文艺思潮，但在晚清末年，它吸引中国读者的主要是其作品中表现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一如鲁迅所言，那时的拜伦，主要以其“头裹花布头巾”，助希腊独立的斗士形象，令人“神旺”。而在五四时

期，对浪漫主义的接受和理解便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思想基础之上了。五四时期所谓“人的觉醒”、“人的发现”，首先是“个性的觉醒”，“个人的发现”，郁达夫说：“‘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正是这种富于时代特征的个性主义构成了联接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浪漫主义的最坚固的思想纽带，并在五四时期掀起了浪漫主义的大潮。在当时，许多在创作上和气质上都与浪漫主义格格不入的作家，如周作人、叶圣陶、郑振铎、冰心等人，在文艺观上也赞成浪漫主义自我表现的观念，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受到个性解放的思想推动，因为前者可说是后者在文艺观上的直接引伸。但即令是如此，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仍未被五四作家全盘吸收。例如：西方浪漫主义的一个核心范畴：想象，以及柯勒律治等人关于想象的详尽的讨论，就被郭沫若等人搁置到一旁，这决不能看作是一种疏忽。浪漫主义者强调想象是出于对十七世纪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以牛顿机械力学为代表的科学观的反抗，从更深一层看，是对当时流行的启蒙哲学的反抗，浪漫主义者认为启蒙运动人物心目中的世界太狭隘，企图用理性来剖析一切生命，把人类的知识限制在感官世界，结果使生命机械化。卡莱尔说“狄德罗习以为常的世界”，其实只是“半个世界”，却被扭曲成看起来象“整个世界”，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所绘的一幅牛顿肖象，把牛顿贬落在物质世界中，使他两眼失望，仿佛试图以一具圆规，即单凭“理性”来丈量这个世界。与启蒙主义充满光明的世界相比（启蒙一词的原意就是照亮），浪漫主义醉心的是神秘的夜晚，只有在夜晚，他们才能超越时空进入无限的境界，才能“举起灵魂的沉重双翼”。诺瓦里斯说“在我看来，亮光是多么幼稚和微不足道呀。”他不要空中闪烁的星辰。

宁要“夜晚对我睁开无限的双眸”。对无限的向往，是浪漫主义最普遍的主题，即使现实如歌德，也通过他的浮士德以独特的方式

追求着无限，但诗人要达于无限，却只能依赖心灵主动有机的创造，依赖自身独具的神圣的天赋，即想象，只有想象，能够引导浪漫主义者进入无限的本体世界，消除他们普遍怀有的那种“形而上学的焦虑”，所以布莱克把想象称为“神性的视力”。由此可见，想象理论在浪漫主义诗学体系中，不仅仅是一个创作心理范畴，而是一个负载着复杂的哲学和历史内涵，构成浪漫主义思想的核心纽带的重要观念。

想象，是浪漫主义的缪斯女神用来制服它的宿敌科学的武器，然而这个武器在中国却没有用武之地，因为那种浪漫主义式的“诗与科学”的对立，在五四时期的中国还遥遥无期。布莱克等浪漫主义诗人在诗中谴责资本主义都市文明带来的罪恶（如布莱克的《伦敦》），而中国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在他的《女神》中却把大都会作为近代文明的象征加以歌唱。闻一多在《女神的时代精神》一文中特意指出，《女神》中包含的浓重的科学成分。它所显示的“真艺术与真科学的携手进行”乃是一种“时代精神”，这一结论是十分正确的。只是这种时代精神与浪漫主义时代的时代精神是恰相反对的，这种时代精神的差距，使中国最钟情于西方浪漫主义的作家，也只能对其作有限度的吸收，包括遗漏掉许多就西方浪漫主义自身而言是十分本质和精要的内容。

如果说，将中国作家与浪漫主义联系起来的思想纽带是个性主义。那么，将五四作家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的思想纽带就是人道主义，五四时期，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最能适应当时思想启蒙的历史要求，而这也恰恰是当时许多作家选择现实主义的初衷，直到许多年以后，鲁迅仍然强调，他写作小说的目的，就是早年怀抱的启蒙主义。但即令如此，由于处于不同的文学传统和历史背景，中西现实主义仍有许多深刻的差异，尽管二者都要求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但它们的出发点，侧重面以及具体的内涵都是不同的。十九世纪批

判现实主义文学是作为浪漫主义的对立物登上历史舞台的，它与浪漫主义的最尖锐的冲突，首先表现在文学的题材上，浪漫主义作家热衷于表现风花雪月男欢女爱之类生活中美好的事物。而现实主义者则要求扩大文学的视野，正视人类的苦难。这种分歧常常在现实主义初起时构成两派论争的焦点。例如，在俄国自然派文学初兴时，反对派便指责“自然派”专门反映丑恶的生活，描写社会“肮脏的后院”。因此，别林斯基为果戈理等自然派作家辩护，号召诗人“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裸的真实中再现生活”。他所指的，就是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黑暗和丑恶，完整地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后来的自然主义作家从描写社会的黑暗与丑恶进而描写了人性中的黑暗与丑恶，即人性中潜藏的兽性。在二者之间，是存在着某种逻辑的关联的。但在五四时期，由于缺乏这种浪漫主义的历史背景，所以题材问题从未成为论争的焦点。相反，早在晚清的谴责小说和黑幕小说中，作家就将笔触伸向种种丑恶污秽的生活现象，并在描写中经常伴随津津有味的玩赏。对于中国现实主义作家来说，要和这些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黑幕小说划清界限，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描写黑暗与丑恶，而是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来描写黑暗与丑恶，这样五四现实主义作家呼唤的，便首先是一种正确的新的的人生观，一种积极的生活理想。这种文学要求与时代的启蒙精神相结合，便产生了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特有的理性主义倾向。西方的现实主义作家出于对浪漫主义主观性的反拨，都很重视创作态度的客观性，即使是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不例外，他们的作品的思想力量也主要表现在敏锐地揭示出生活中潜藏的时代重大问题，而不是回答这些问题，但五四现实主义作家由于自觉地意识到肩负的启蒙使命，意识到向广大民众宣传新思想，指示生活方向的不容推诿的历史责任。因此他们不仅提出问题，而且热心地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解答这些问题，尽

管这种解答常常是匆促的，幼稚的。五四时期的“易卜生热”，大量涌现的问题小说，都反映了这种愿望。五四现实主义的这种强烈的倾向性，从根本上阻断了西方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对倾向性的过分的强调，也容易在倾向性与真实性二者之间造成某种紧张，产生某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在某种政治气候下适应着某种特定的政治需要，甚至可能牺牲艺术的真实性，使现实主义文学转化为伪现实主义或反现实主义文学。

一旦我们对五四时期独特的思想和文学需要有所认识，那么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一度遭受的冷遇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当然，我们并不能以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曾经遭到拒绝为由来否定现代主义作品的艺术价值。在卡夫卡、艾略特、福克纳等人的作品已经进入西方文学经典的行列时，再试图象卢卡契那样用“颓废”之类的类眼来概括它们的艺术品质便未免过于简单粗暴了。然而，现代主义文学的意义，从整体上来看，仍然必须联系它所从出的高度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独特的文化氛围，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尔诺等人所指出，为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化了的文化工业及其所生产的大众文化，与社会保持着虚假的表面的统一，使人们对现实抱着虚假的幻想，而停止认真的思考，现代主义文本却以其难以卒读的奇崛的形式，使人们悚然而惊，重新对现实产生一种陌生化的感受，并通过它的荒诞不经的形象和支离破碎的语言使人们直接感受到现代社会本身的荒诞不经和支离破碎，从而获得对于现实的一种“否定”的认识。但是，这种意义和价值，却是处于刚刚开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转换的历史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所难于认识和接受的。因此，正是我们在本节开始时所提到的那种东西方历史的巨大的“错位”直接将五四文学与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西方文学思潮分隔开来了。

在这里，我们便触及到了一个在进行跨文化研究时不可能回

避的价值判断问题。正如我们不能根据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命运来判断它在自身的文化系统内的价值，我们也不能以某种文学在自身的文化系统内的功能、价值和意义为依据来判断它在另一文化系统内的功能价值和意义。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例如过去由于尼采与法西斯主义在思想上的亲缘关系，我们便一直讳言他对五四时期许多进步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巨大影响，其实在尼采思想的三大主题，权力意志、超人哲学、“重估一切价值”中，在五四时期产生影响的主要是最后一项，可以说发挥的基本上是一种积极的作用。因此，当一种思想学说或文学思潮从一个文化体系转入另一个文化体系之后，我们就必须依据它在新的文化系统中的性质来确定其特征，依据它在新的文化系统中的功能来判断其价值。如象人道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西方近代思潮，一旦进入中国，其性质便发生了重大的变迁。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改变，如果我们继续不加反省地在西方原有的意义上使用这些术语，并用它们来描述中国现代文学中某些与之相类似的现象，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铸成大错。例如，我们惯常称郭沫若为中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但却很难得反省一下，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的，如果是在西方原有意义上，那么显然包含着某些误解。如果指的是一种中国式的浪漫主义或中国化的浪漫主义，那么这种浪漫主义的特征是什么？它与西方浪漫主义的区别何在呢？直到现在，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比较认真的回答。当代解构批评指出，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总是存在着种种游离、变化、迁移。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术语，即使在欧洲那样一个统一的传统和背景中尚且依据其不同的上下文关系有着种种繁复的变化，那么当它们被输入到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古老传统的东方国度之后其变异自然就更大。如果笼统地将这一术语所代表的西方文学模式加诸中国现代文学，而不对这一术语在中国衍生的新的意义和内涵加以考察，那么这些

术语就不仅不可能帮助，而只能阻碍研究的深入。

二

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一项最有力的责难，就是它造成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某种“断裂”，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的确，五四时期西方思潮，包括西方文艺思潮的大规模输入。正是以传统的某种形式上的“断裂”作为条件的。很明显，从一开始，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就是作为对传统文学和文艺思想的一种克制出现的，是在旧的封建文艺思想体系作为已经解体的封建文化的一个部分丧失其功能的情况下作为它的一种替代物引进的。是五四知识分子为了填补旧文化体系的瓦解所造成的思想真空接受过来的。因此，一方面，如果没有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抨击，如此大规模的西方思潮的输入是难以设想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大量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作为参照，作为后盾，那么这种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彻底反省和批判也是不可能的。从历史上看，二者是互为因果的。

问题在于应当怎样评价五四知识分子这种激烈反传统的行动。我认为，这个问题既不可能从纯粹思想史的角度，又不可能从客观的社会背景中求得比较圆满的回答，要想回答这一问题，要想解释这一历史的悖论，我们只能将着眼点放在将这一矛盾具体地统一起来的主体——五四知识分子身上。因为在文化意义上说，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自身正是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统一体。这一点，可以通过考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清楚地揭示出来，从词典的字面意义上讲，传统乃是保存在某一团体中并为后代采用的文化形式，它不是通过生物的种的遗传来保存，而是通过社会历史所沟通的文化渠道来传递和延续。而这种传递的主要渠道，或者说影响的主要方式，便是教育。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来探知他与传统联系或疏离的程度和方式，就教

育背景而言，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十分独特，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代。一方面，他们和其前辈一样，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极其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而且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文学兴趣。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他们青年时代投考新式学堂或留学生时，在英文、格致（自然科学）、国文（古文）等数科中，他们的国文成绩总是最高的。他们对传统文化所具有的那种深厚广博的学识，是后来的知识分子难以望其项背的。正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对传统文化才能反戈一击，切中要害。但是，与他们的前辈，如康梁等不同的是，他们在青年时代，在理性觉醒的时期，又经受了西方近代文化的熏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远赴欧美或日本留学，直接在西方文化环境中系统地接受其教育和影响，使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较之梁启超等前辈那种通过翻译所获得的间接的、有限的了解要深入系统得多。当他们学成归国以后，便成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负载者和介绍人。因此，在知识结构上，他们的确是学贯中西，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于一身。在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上，他们是十分独特的一代。

然而，这种独特的思想背景在那样一个转折的年代给他们带来的可能是更多的痛苦和不安。在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五四前后发生的激烈的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事件，也是一场心理的风暴。在他们内心深处，东西方文化撞击的激烈和深刻程度，是任何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无法比拟的。这常常构成他们剧烈的心理冲突和某种焦灼感。五四时期这批知识分子激烈地反对传统，除外在的考虑外，不妨说，也是他们摆脱内心焦虑和冲突的一条途径。

一般地说，任何过去的传统总是与现代的生活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因为即使是再完美的传统也不可能将人们此时此刻要作的事规划得十分详尽，必然会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出现某种改造、调

造。在五四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在面临现实的危机和外来文化挑战的情况下，已充分地显示出自身的僵化。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人们选择“摆脱旧套，收纳新潮”的道路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向。后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五四知识分子一定要对传统文化采取这样一种激烈的否定态度。这里，原因或许就在于，现实地实行着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使命的知识分子，恰恰就是中国现代最富于传统精神和文化的一代知识分子。后人已经很难理解传统在他们身上造成的重负和不安，也很难了解新旧交替的文化嬗变在他们内心所造成的分裂和痛苦。这种分裂和冲突发生在他们精神的每一层面，其中不仅有观念与观念之间的冲突，更有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冲突。即使是在文化先驱鲁迅那里，我们也能看到，他并不否认在自己身上仍然留存着“庄周韩非的毒”，满怀痛苦地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他们对传统加之于自身影响的深刻程度认识越清楚，他们对传统的负累感到越沉重，那么他们为了摆脱传统所作出的努力也就越大，对传统的反抗也就越激烈，在他们身上传统包袱的沉重与反传统态度的坚决和彻底往往是成正比的。例如在五四知识分子中，如郭沫若、茅盾这样一些比较年轻的成员，由于这种重负感稍轻一些，所以他们对传统的态度，较之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就要稍微缓和一些。这种对传统重负的意识，是他们激烈反抗传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作家主体的角度看。这种反传统首先是他们自我的一种解放，是他们对传统，同时也是对自身的一种自觉的超越。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这种深刻联系，一方面使他们为了摆脱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历史的惰性”，不得不采取十分决绝的态度和行动，但另一方面，他们拥有的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又使他们始终与传统保持着似断实续的关系，他们的激烈反传统的态度，只能使他们超越这种传统，却不能使他们脱离这种传统。由于他们与传统保持着这种“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